



● 作者/Kenneth M. Pollack ● 譯者/章昌文 ● 審者/黃坤銘

中東紛擾不斷的權力真空

The Middle East Abhors a Vacuum: America's Exit and the Coming Contest for Military Supremacy

取材/2022年5-6月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 May-June/2022)

二十世紀末相對穩定的中東局勢，卻因科技蓬勃發展與美國黯然退場，而破壞原有軍事平衡。弱國乘武器發展之勢，搖身一變成爲軍事強國。美國退場造成的權力真空，更讓各方勢力爭相競逐。如何在資訊時代重新形塑中東的穩定局勢，是值得深思的課題。



美陸軍關島國民兵第294步兵團第1營官兵結束部署任務，搭乘CH-47型「契努克」(Chinook)直升機離開阿富汗。(Source: USANG/Eddie Siguenza)



看似荒誕，但或許觀察家簡要回顧過往後，就會將二十世紀末視為中東地區相對穩定的時期。儘管不乏衝突和混亂，但暴力事件卻鮮少帶來巨幅改變。沒有國家遭澈底征服或消滅。即便獨裁者來來去去，但國界乃至政權都無大幅變動。1973年後，該區域大部分主要國家停止正面交鋒，而改以恐怖主義和叛亂等弱者戰略來取代傳統攻擊。但是，伊拉克總統海珊(Saddam Hussein)和利比亞領袖格達費(Muammar al-Qaddafi)花費較長時間才領悟到這個道理。不過從海珊的所作所為即可發現，他並未全然領會其中教訓。但他們兩位實屬特例，並非常態。

追根究柢，上述特例凸顯出當局者輕忽大意，而忘了「穩定其實是一種偏態軍事平衡，這種平衡鮮少改變」。上層或許紊亂不斷，但中東安全基礎依然穩若磐石。在光譜一端的美國持盈保泰，只要投入適切軍事力量，就能擊敗任何敵人。緊隨其後的是軍事力量驚人的以色列，其從美國獲得武器並能自主運用。光譜另一端則是阿拉伯國家，即使彼此相互征戰也無法有效發動現代戰爭。伊朗和土耳其則介於光譜中間，但更趨向後者，偏向弱國光譜端。

鑑於這些懸殊差異，只有美國和以色列會經常使用武力來對付外部敵人，兩國堅定捍衛現狀，傾向以行動來維持既有秩序，而非改變現況。當然，上述情況也有例外。1982年，以色列動用武力，試圖改變黎巴嫩政權，結果陷入長達18年的游擊戰泥沼，最終無功而返。2003年，美國出兵伊拉克，也遭逢類似命運。

因此，過去30多年，中東地區從未發生大規模

國與國傳統戰爭。2006年黎巴嫩戰爭，以色列對黎巴嫩實質統治實體真主黨(Hezbollah)發動戰爭，這也非常態。雙方不願發動戰爭，卻因無端捲入而遭到重創，從此即未重蹈覆轍。

上述情勢開始有所改變。近年來，中東軍事平衡的堅固蛹殼開始出現裂痕，釋放出一群二十一世紀復仇女神，威脅要重建該區域的樣貌。隨著新的軍用和民用科技問世，加上美國思忖要淡出該區域內政，中東國家愈來愈難判斷誰才握有戰略優勢。即便想方設法讓各國政府相信，他們或許能善用未經測評的全新武器來取得勝利，但資訊時代戰爭的出現，卻對支配中東近半世紀的地緣政治規則侵門踏戶。

未來潮流

戰爭不斷改變，人類循環反覆尋求全新的自我毀滅方式。戰爭都會有所差異，但差異有時相當顯著。通常，經歷重大經濟轉型後的差異最為顯著，因為重要的軍事科技變革多半來自非軍事領域的研發成果。鐵路、電報、無線電、飛機、內燃機、原子的秘密——最初都是為了改善民生環境。上述科技紮根茁壯後，很快就投入戰爭，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

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工業革命澈底改變作戰型態，而今日的資訊革命也有異曲同工之妙。世界各地的軍隊花了將近一個世紀，才能瞭解工業時代戰爭的成熟面貌——如何有效投入作戰，以及準確預測相關軍事能力。同樣地，當今軍隊也在琢磨要怎麼打一場資訊時代的戰爭。全新技術不斷湧現，但誰將主宰戰場？誰將被邊緣

化？目前仍然沒有定數。

一如軍事專家密斯柯(Jay Mischo)和筆者所推測，戰爭的巨大科技變革往往會遵循類似的三階段路徑。新科技起先不過是種新奇發想。試想第一次世界大戰使用的首架飛機。基本上，早期飛機就是不堪一擊的怪東西，只是用來飛在空中進行偵察。接下來，駕駛員開始攜帶槍枝，射殺敵飛行員，不久後，更使用炸彈攻擊敵軍部隊。儘管未能對地面戰鬥產生關鍵影響，有許多人看見其中蘊藏的可用潛力。

這類潛力引領了下個階段，嶄新軍事科技常被視為解決現存問題的良方。例如，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陷入膠著，空中武力開始直接攻擊敵人本土、工業基地、人口稠密區，甚至是敵方政府機關。戰爭過後，義大利將領兼軍事理論家杜黑(Giulio Douhet)對此概念下了合理但不切實際的結論——空中武力可完全避開地面戰的大屠殺，至少擁有大量優勢空軍部隊的一方，能夠以最輕微的生靈塗炭，快速取得決定性勝利。

追根究柢，一些新興科技顯

然極具價值，也發展出專屬作戰領域，而這通常和軍種執行的特定任務息息相關。飛機、潛艦與機械化車輛都在工業時代進入第三階段。國家賦予航空部隊持續遂行空中作戰的任務（即便其配屬在地面或海上部隊時亦然）。即便空中作戰成為其專屬作戰領域，但仍經常投入地面及海上作戰，更與情報蒐集單位、後勤單位、生產中心與指揮暨管制單位遂行聯合作戰。空中優勢進而轉化為其他作戰領域的優勢，但其他作戰領域的當下情況，也可能反過來影響原有部隊從事空中作戰的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空權在空中作戰扮演重要角色，但在其他領域作戰也顯露出其脆弱性。

當前資訊革命帶來許多創新科技，但有哪些科技可以順利通過三階段考驗，在專屬的關鍵作戰領域有所表現，目前仍不得而知。儘管俄羅斯在入侵烏克蘭初期，透過網路科技所取得的進展有限，但該項技術仍然是目前的一時之選。不難想像，成熟的資訊戰就是一場長期作戰。作戰全過程中，網路戰

士試圖粉碎對手、尋求自保並爭奪網路空間主導權。同時，網路戰士會嘗試攻擊敵人動能武器、後勤設施、生產中心、運輸節點與指管系統。當然，敵軍動能武器也可能會還以顏色。此外，正如空中作戰，網路戰可使某些常規衝突領域的作戰效果大打折扣，表現出欲振乏力的疲態。空權最終消滅過往主宰大海千年的大艦巨砲，而網路武器當然也有可能讓其他武器或戰術毫無用武之地。上述種種都會持續不斷上演，也會不斷影響其他作戰領域。儘管這似乎只是一個網路戰想定，但現在仍無法妄下定論。

網路戰並非唯一徹底翻轉作戰的新興科技。工業時代中，衝突常常會圍繞戰車、戰艦、戰機等機械化載臺打轉，而這也是衝突的核心，這種觀念至今仍然可見一斑。分析師要評估一國軍隊或雙方軍事實力時，他們立刻會考量載臺。有多少戰車？何種戰車？多少架飛機？各型船艦數量為何？如同數十年前，政治學家波森(Barry Posen)在課堂上所提及：在工業革命後，軍隊從「以官兵為本、將官



未來的網路戰可使某些常規衝突領域的作戰效果大打折扣，也有可能讓敵軍戰術失去效用，影響擴及其他作戰領域。(Source: DVIDS)

兵武裝」的人本思維，轉變成「武器至上、唯武獨尊」的唯物論調，因此武器變得比人員還重要。

但工業時代的軍用載臺卻不符當前實需，而不易納入聯合作戰體系，難以維修、保養與量產。操作人員必須嫻熟新興戰爭機器與相對應複雜戰術，才能讓這些武器發揮出最大效能。這類武器使用方式複雜，

而且執行最佳作戰行動的難度極高，導致不同武裝部隊在運用上產生極大效能差異。有些部隊——諸如二十世紀初期的德國、後期的美國與以色列部隊——即為這方面的佼佼者。由於各種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因素，其他國家的軍隊永遠無法成事——尤其是阿拉伯國家。到了工業時代晚期，大多數國家對上述差異都了然於心。

現今，新型彈藥日益降低軍用載臺本身的重要性。工業時代，大多數戰爭機器發射毫無自主導引能力的慣性彈藥——子彈、炸彈、榴霰彈。即便同時期的魚雷和飛彈也鮮少運用導引系統。由於載臺負責執行機動、系統整合與瞄準目標，實際執行項目高達99%，如此簡單的科技高度仰賴載臺本身發揮最大效果。愈來愈多精靈彈藥——以

及人工智慧加強型彈藥——正在獨立遂行上述作業。精靈彈藥問世已近50年，且它們逐漸成為戰場上的主要武器系統。

F-35第五代戰機就是上述趨勢的案例。F-35不適用於空中纏鬥，但因其空戰能力差而加以批評，就像是因為槍上不入流的刺刀而批評M16步槍一樣。在現代，任何想在M16步槍上裝刺刀衝鋒的人都無權指揮步兵。老舊戰鬥方式會葬送該步槍的非凡戰力，同樣地，昔日的空中纏鬥也會糟蹋F-35的卓越性能。相對地，F-35具備機動投射能力且掛載精準導引彈藥。該機種配備精密感測器，機載通信系統能夠鏈結其他形式的感測器與武器發射載臺，並且具備匿蹤與電子戰能力，可突穿現有防空系統。但它不是專為空中纏鬥與發射致命武器而設計的工業時代戰機。相對地，只要目標進入F-35射程範圍內，機載彈藥幾乎都可以自行擊中目標。

F-35的多元性能揭開未來戰爭的另一波潮流：卓越感測器結合長程彈藥，接續由戰場管理系統進行整合，全程由人工

智慧驅動。在如此世界中，載臺幾乎毫無功能。彈藥直接接收感測器資訊，最後由資訊處理能力優於人類的戰場管理系統進行指揮，逕行完成所有變軌與接戰流程。各項次系統密切整合後，這些武器系統就能快速進行目標識別、威脅評估與火力分配，最終如期摧毀目標：不斷重複整個流程。

無人機戰爭

F-35和類似複雜武器造價高昂。有些中東國家財政健全，編列充足國防預算，且與美國交好，可以籌獲美製武器。以色列所購買的F-35已經開始服役，緊接著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最後連沙烏地阿拉伯也可能會順利籌獲。不過，埃及、伊拉克和約旦獲得的機會則近乎渺茫。但這些財政較不寬裕、與美國關係較不緊密的國家依舊可以取得無人機。

無人機快速崛起也成為資訊時代戰爭的重要元素。許多價格低廉：改裝後的兒童玩具，卻能以離奇方式致人於死地。由於無人在機上操作，對不願在

戰爭中犧牲人命的國家，無人機有其吸引力。此外，無人機本身就是絕佳的資訊戰彈藥，其飛行距離長、配備內建感測器、具備匿蹤能力且能執行精準打擊。許多廉價無人機可避開昂貴科技產品(包括傳統早期預警雷達與防空雷達)的偵測，防空武器也很難以將其摧毀，但其卻能夠精確打擊脆弱目標。

無人機並非萬能，卻深具發展潛力。其自主能力可以不斷提升，進而制衡或壓制未來的反制措施。許多國家致力研發微型無人機以避開敵人偵測，建造無人機機群來癱瘓防空系統，而微型無人機機群則可做到兩者兼顧。各國也在努力改善無人機的致命弱點——需要一名地面操作員來進行某種形式的導引。儘管演算法具有遭敵破壞的風險，但精密指管系統在結合人工智慧導引的自主無人機後，可消除此種不利條件。對於附帶損害有所顧忌，可能會讓服膺公理的國家做起事來綁手綁腳，或者讓當今強權有所忌憚，進而試圖避免衝突升溫。但對信奉虛無主義的恐怖組織、深陷存亡之戰或願意投入



F-35型戰鬥機透過戰場管理系統，能快速進行目標識別、威脅評估、火力分配，終至摧毀目標。此型機即將揭開未來戰爭的另一波潮流。(Source: Lockheed Martin)

戰場、放手一搏的國家來說，這樣的顧慮可以說是毫無意義。

過去75年來，中東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實驗室。所有武器製造商都曾在此地的戰爭中測試最新型殺人機器——蘇聯在埃及作戰、美國出兵伊拉克、俄國遠征敘利亞。無人機也不例外，從便宜得驚人到貴得離譜的各

種機型，逐漸主導中東戰事——無人機正在顛覆該區軍事平衡。

例如，過往土耳其的軍隊曾被專家拿來消遣。儘管土耳其政府喜歡吹噓其軍事能力，但近年來，其武裝部隊在對抗庫德族(Kurdish)叛軍或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ISIS)戰士方面都乏善可

陳。後來，無人機在土耳其粉墨登場。現在，他們因無人機重拾鄂圖曼民族(Ottoman)的過往榮耀。2020年，利比亞叛徒強人哈夫塔(Khalifa Haftar)圍攻首都的黎波里(Tripoli)，攻下這座城市看來只是遲早的事。隨後，土耳其政府部署大批技術顧問和無人機，使利比亞中央政府得以擊潰

其部隊，迫使其進行政治談判。同年，敘利亞政權派遣一支在伊朗和俄國援助下重建的裝甲部隊，對伊德利布(Idlib)這個反對派據點發動大型攻勢。然而，就在敘利亞部隊往北機動途中，一群土耳其無人機突然從天而降——地面部隊就像任人宰割的羔羊，全數慘遭殲滅。最後，在2020年尾，另一支土耳其無人機隊，使亞塞拜然(Azerbaijan)在最近一輪納哥諾-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領土爭議中，澈底擊潰亞美尼亞(Armenian)地面部隊。

土耳其並非唯一善用無人機的國家。伊朗也把它視若珍寶，將它們——連同技術顧問、訓練課程及作戰指導——提供給中東地區盟友和代理人。2019年9月，伊朗大約派遣24架無人機，並且發射三枚巡弋飛彈，攻擊位於艾卜蓋格(Abqaiq)的大型沙烏地石油加工中心，無人機避開遍布該區域周邊的防空系統，成功癱瘓沙烏地阿拉伯將近半數的石油生產，其影響期間長達數週。

從那時起，伊朗的盟友和代理人就一再以無人機攻擊美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部隊，並對沙烏地阿拉伯持續發動空中攻擊，主要(但不完全)由葉門叛軍青年運動(Houthis)執行。這類攻擊效果顯著。沙烏地阿拉伯多年外交斡旋未果，最後在2021年5月，無奈地在巴格達與伊朗人面對面會談，背後原因為：2021年4月，該國不斷遭到攻擊，青年運動和其他伊朗代理人總共發起84次無人機、彈道飛彈與巡弋飛彈攻擊。值得注意的是，沙烏地阿拉伯是在首次向土耳其購買無人機未果後才同意進行前述會談。自2022年1月和2月起，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一直遭受襲擾，葉門青年運動與伊拉克民兵組織人民動員軍(Hashd al-Shaabi)——其

組織內部成員均與伊朗相互依存——定期發動如冰雹般的無人機與飛彈攻擊。

20年前，伊朗和土耳其國力孱弱，無法在軍事上與鄰國分庭抗禮，對境內俾路支人(Baluchi)及庫德族反對派也束手無策。今天，他們卻能在中東地區進行武力投射且效果顯著。土耳其使利比亞及敘利亞內戰陷入僵局。伊朗首次對沙烏地阿拉伯發動實質空中嚇阻作戰，迫使利雅德(Riyadh)出乎意料地坐上談判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也面臨相同情況，短期間對伊朗做出讓步之餘，一方面也從長計議，盡其所能籌組一支自己的無人機部隊。

美國退場

軍事科技變革並非重塑中東軍事平衡的唯一要素。近五個世紀以來，外來強權始終扮演中東地區區域霸主和關鍵安全保證人的角色。十六世紀中葉，鄂圖曼土耳其人(Ottoman Turk)征服大部分中東地區，並維持將近400年統治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戰，鄂圖曼帝國垮臺，由英國接管，隨後展開長達50年的統治，直到1968年放棄對蘇伊士運河以東的「帝國責任」才劃下句點。美國即便百般不願，最終還是接下燙手山芋，並在後半世紀擔負這個重擔。

從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掌權開始，美國逐漸淡化自己在當地的影響力，慢慢放手當地事務——即便當局矢口否認。川普執政時期，美國背棄區域盟友並煽動其他國家，在國際間搖擺不定，以更明目張膽、雜亂無章的手段撤出蘇伊士相關事務。至於拜登團隊，則是對中東盟友不



斷表示，美國總統毫無進一步抽離的意圖，反而想方設法、重新介入當地事務。然而，華府時間、精力和資源有限，要滿足數以千計的其他需求，重新介入中東地區事務根本就是癡心妄想。拜登或許心存此念，但實在心有餘而力不足。

美國退出中東事務而造成安全真空。以伊朗及其盟友為首，最殘暴且侵略性十足的襲擾部隊，全都爭先恐後填補權力真空。在伊朗及其盟友處於谷底的2010年及2015年，美國在伊拉克大量增兵、其盟友敘利亞幾近崩解。與此同時，德黑蘭及其臭名昭彰的狐群狗黨——敘利亞阿塞德(Assad)政權、葉門青年運動、黎巴嫩真主黨、哈瑪斯(Hamas)和加薩走廊(Gaza Strip)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以及來自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敘利亞的什葉派民兵組織——在地區內戰和拿手的非傳統作戰中重起爐灶。此戰略簡直與伊朗將領蘇雷曼尼(Qasem Soleimani)拿手絕活如出一轍——以民兵取代正規軍——擴展伊朗在伊拉克、黎巴嫩、敘利亞與葉

門等國家的影響力。

伊朗迅速崛起與美國不合時宜的撤退，讓美國的區域盟友措手不及，也讓一些國家以跌破眾人眼鏡的方式團結起來。例如，巴林(Bahrain)、摩洛哥(Morocco)、蘇丹(Sudan)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就加入埃及和約旦的行列，藉由簽署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與以色列言歸於好。沙烏地阿拉伯也蠢蠢欲動，不過可能要等到沙爾曼國王(King Salman)過世才會有所動作。這些國家從前對猶太國家深惡痛絕，但仍因該國強大的軍事實力及願意挺身對抗伊朗而讓步。隨著以阿衝突落幕，許多人對這種新興邦誼讚譽有嘉。然而，即便將懸而未決的巴勒斯坦問題擱置不談，如此觀點仍然忽略一項事實：這個成形中的戰爭聯盟，最終還是基於同仇敵愾、為了對付共同的敵人，而不是為了營造天下太平的榮景。與此同時，卡達(Qatar)、土耳其與半數利比亞人民則基於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間的相互理解而緊密結合——這是一個毫無共同戰略目標、由烏合之眾組成的怪異軍事

聯盟。

美國在長期淡出該地區後，國與國之間更是紛擾不斷，而大多數人預期這將成為新常態。例如，2015年，沙烏地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介入葉門內戰，以阻止伊朗勢力擴張。伊朗在該地區有所斬獲後，兩國不斷要求歐巴馬政府出兵干預，但美國毫無作為。因此，他們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採取明確行動，但最後卻引來無妄之災。過去十年間，以色列曾攻擊敘利亞境內的伊朗目標數百次，近期更將注意力轉往與伊朗結盟的伊拉克民兵上。伊朗和以色列深陷網路戰，目前情勢升級，伊朗開始攻擊以色列境內醫院，以色列也反攻伊朗境內加油站。土耳其部隊正與俄國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在敘利亞的代理人、敘利亞政權及敘利亞境內的伊朗部隊作戰。

中東地區的恐怖主義原為華府長期關注焦點，但現在已經不是第一要務。因為恐怖主義是弱國戰略，而該區域戰爭轉型，使過去弱小的國家能夠投入更傳統的軍事行動，此種發展對美國和中東地區來說都不是件好事。

因此，不難想像，美國撤退似乎會在中東國家間引發鬥爭，爭奪美國在該地區原有的領導地位。有些國家一股腦投入地位爭奪戰，而其他國家則透過戰爭來阻撓此事。即便不從人願，過程也是極其血腥、動盪不安。鄰近地區就算不到生靈塗炭，也必定會遭受波及。

戰爭迷霧

新興科技和霸權撤退這兩項因素結合後，容易引發衝突。畢竟，當人們無法準確評估軍事平衡時，就更容易發生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種現象在中東地區更是明顯。1948年到1973年間，阿拉伯國家自認國力逐年增強。然而，經歷五場戰爭後，以色列澈底摧毀他們一廂情願的看法。自此之後，就沒有阿拉伯國家試圖公然挑釁以色列。實際上，對大多數阿拉伯國家而言，可謂潰不成軍——政治聲望一落千丈——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停止以傳統軍事武力作為外交手段。

兩伊戰爭(Iran-Iraq War)則是另一個例證。1981-1982年，伊朗在衝突期間積極發展，讓他們具備打贏伊拉克的武力。但德黑蘭錯估這些能力也有其極限，在征服伊拉克的六年多時間裡，慘遭轉型後的伊拉克地面部隊以及美國海軍艦艇擊敗。這也讓伊朗人明白他們多麼不堪一擊。隨後，伊朗改採其他手段，以避免美國以傳統軍事行動干預。儘管伊朗從未放棄首任最高領袖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矢志控制該區域的野心，但也確實揚棄傳統軍事武力手段，轉而採用顛覆、游擊戰、恐怖主義與其他間接及非傳統手段發動攻擊。

在伊拉克，海珊本人就是個例外狀況。1990年，儘管海珊認為美國極可能軍援科威特(Kuwait)，仍然對科威特發動攻擊。2003年，巴格達淪陷，從蒐獲的談話錄音和文件內容可以清楚瞭解，海珊是充滿妄想的領導人，經常扭曲事實來滿足內心盤算。即便核心圈成員不斷提醒，不要與美國交戰，但他卻置之不理，因為海珊相信伊拉克軍隊比美國軍隊更為強大。只有像海珊這種充滿妄想的領導人，才會認為阿拉伯國家可以和美國抗衡，別人可沒那麼愚蠢。

過去十年，這些戰略穩定開始瓦解。崩解的部分原因，是不清楚美國在中東真正捍衛的對象是誰，或是為了什麼事物。如果美國對伊朗公然攻擊阿布蓋格——波斯灣石油生產中心及全球經濟核心——都不願出兵，那什麼才會讓美國願意派兵平亂？這是中東戰略情勢現存的重大不確定因子。

也因為軍事科技轉型，中東地區過往軍事平衡也正在瓦解。不可諱言，有些國家較能有效運用新興戰爭工具。目前，就中東地區來說，伊朗和土耳其充分運用這些變革——重新取得數個世紀前失落的軍事影響力。但隨著這些影響深遠的變化在中東地區重新分配權力，分析師和領導人根本無從得知最終鹿死誰手。例如，瑞典與普魯士分別在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成為軍事強權，隨後就驟然殞落，這均非顯而易見的事。

此外，二十世紀初期，英國看似成為工業革命軍事轉型後的最大贏家。英國在這場革命中獨領風騷，也是大部分顛覆性創新的泉源，還發明許多催化當代戰爭的關鍵工具：蒸汽機、潛艦、戰車、火炮戰艦、火車頭、機關槍、航空母艦、雷達、



聲納與噴射引擎等。英國可能是工業革命前最強大的軍事強權，但在工業時代卻淪落為中型國家。其衰落不僅是肇因於經濟衰退，也導因於無法有效運用這些武器。

這故事的寓意是，外部觀察家根本無從得知哪個國家(或非國家行為者)具備發動二十一世紀戰爭的能耐。分析師、指揮官和領導者尚未親眼目睹戰爭洗禮的結果前，他們可能也一無所

知。承平時期的操演、訓練、演習，甚至是準則和教育訓練也只能透露些許眉目。開戰前，各國均無從得知平時戰備整備是否奏效，誰又最瞭解武器系統性能且能將其發揮到極致。但我們

若能正確看待中東軍事平衡狀況，其戰爭頻次和嚴重程度就會逐漸減少。圖為2019年8月20日，聯合國安理會召開中東和平安全會議。(Source: US State Department/Ron Przysucha)



必須謹記，1940年5月，幾乎全球軍事界專家都深信，相較於德國，法國軍隊訓練精良，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累積豐富作戰經驗。不過，戰爭結果卻正好相反。

現在，我們更應該將此銘記

於心。工業時代，無論各國政府如何保密，計畫人員仍然可用戰車、飛機和戰艦來評估戰力。即便如此，仍然難以衡量資訊時代的部隊作戰能力。正如軍事分析家克拉莫(Rachel Kramer)的觀察結果，「不透明性」(Opacity)是網路戰的必要條件。在戰爭分出鹿死誰手之前，幾乎不可能全盤掌握參戰部隊的真正實力。在網路戰中，一旦破綻遭敵偵知，必定會盡全力改善，避免敵軍占盡優勢。大家都心知肚明，將真本事攤在陽光下必死無疑。正因為如此，更難區分孰強孰弱與彼此軍力差距。

未來局勢詭譎多變

1948年到1973年，阿拉伯國家不瞭解自己的弱點，而以色列人尚未秀出真正實力。兩伊戰爭初期，伊朗出乎意料地發展出全新能力，讓鄰國(和美國)忐忑不安，但伊朗卻也高估自己部隊的能耐，海珊則從頭到尾誇大伊拉克的軍事實力。前述案例中的各種誤解都讓情勢更加惡化，進而造成更多更長期衝突。相較之下，若能正確衡量該區域的軍事平衡，中東戰爭的頻次和嚴重

性就會逐漸減少。雅典人(Athenian)曾警告米洛斯人(Melian)，強者可為所欲為，而弱者只能逆來順受。不論是否公平，這都是保持和平最有效的方式。

今天，關於戰爭，問題永遠多於答案。在局勢不穩定的情況下，試圖用暴力改變現況的人就會更加肆無忌憚，讓弱者高估自己的本事，試圖以不符合常理的手段削弱強者。當戰爭之霧氤氳繚繞，該地區就更容易陷入衝突泥淖，而親身體驗戰爭的可怕。過去的軍事平衡維持中東相對穩定，這種認知正在逐漸瓦解，與此同時，科技和戰略層面的變革也緊跟而來。因此，中東正處於多事之秋，每個人都該為未來的風暴提前整備，未雨綢繆。

作者簡介

Kenneth M. Pollack 係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資深研究員。

Copyright © 2022,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ublisher of *Foreign Affairs*, distributed by Tribune Content Agency, LLC.

